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逢振 主编

詹姆逊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Fredric Jameson

第5卷

论现代主义文学

苏仲乐 陈广兴 王逢振 译

Fredric R. Jameson

The Modernist Papers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逢振 主编

詹姆逊文集

第5卷

论现代主义文学

苏仲乐 陈广兴 王逢振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詹姆斯文集. 第5卷, 论现代主义文学/王逢振主编; 苏仲乐, 陈广兴, 王逢振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300-16407-6

I. ①詹… II. ①王…②苏…③陈… III. ①詹姆斯, F.-文集②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1832 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詹姆斯文集 第5卷

王逢振 主编

论现代主义文学

苏仲乐 陈广兴 王逢振 译

Lun Xiandaizhuyi Wen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0 mm×228 mm 16开本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张	37.75 插页4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442 000	定 价	1380.00元 (全14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2006年10月，我应邀到杜克大学参加国际会议，借此机会，能再次与老友詹姆逊相聚，自然是一大幸事。我到杜克大学那天，原想请在那里读博士的蒋洪生来接我，但詹姆逊告诉我，他要来机场接我。我当然高兴，却也有些出乎意料，毕竟他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见了面，他才告诉我，因为他妻子苏珊次日要去外地开会，想在那天见到我——他妻子也是杜克大学的教授，尽管不像詹姆逊和我来往多，但我们也是二十多年的朋友了。

那天天气很好，我下午四点左右到达，詹姆逊直接从机场把我接到他家里。他的家我去过几次，还是老样子，只是比以前显得更旧了些，但与乡间的环境却也更加协调。房子后面的棚子里仍然养着十来只鸡（以前多的时候有几十只，鸡蛋吃不完便送给同事或学生），但羊圈里只剩下堆在一起的干草——他妻子告诉我已经把羊送到纽黑文的家里去了。五年前詹姆逊戒了烟，但仍然喝酒。所以一到他家，他便拿出一些干果和葡萄酒，我们边喝边聊。由于我在纽约休息过几天，从纽约到杜拉姆只飞一个小时，一点不觉得累，而他因为和我两年多未见，也显得非常兴奋。我们谈彼此的工作和生活，也谈到他的几个孩子（我都见过）。后来当我们谈他的作品时，他告诉我他把以前有关现代主义的文章收在了一起，准备出版，正在看清样。我问他是否全是发表过的，他说大部分是，也有几篇新的，以前发表过的也都做了校订，有些还做了不少修改。说着他便把目录拿给我看——也就是我们现在这本《论现代主义文学》的目录。

目录的标题使我大感兴趣，可以说全都是关于现代主义作家和作品的。虽然在他以前的著作中也多有论及文学作品的章节，但这么集中论述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的论著却从未见到。随后我又翻阅了他的清样，当即觉得这是一本独具特色的著作，并产生了翻译它的念头。我问他是否可以授权给我翻译，他欣然表示同意，并说“翻译权是你的”。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出过他的四卷本文集，所以2007年英文版刚一出版，我就和该出版社联系，希望将此书作为他的第五卷文集；出版社慨然答应出版，但要求书面授权。鉴于詹姆逊曾答应授权，我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便请求他寄我书面授权。出人意料的是，他说这次国外的出版社不同意授权，理由是中国某家出版社已经主动提出购买版权。因为我觉得该书确有价值，而且已与人大出版社谈好，只好请他协助解决。最终，经过他的努力，总算以原报价的一半购得翻译版权。在此我对詹姆逊的帮助和人大出版社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论现代主义文学》英文原名是《现代主义文选》(*The Modernist Papers*)，由于所有文章都论述现代主义文学，所以征得他的同意，中译本改为《论现代主义文学》。这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詹姆逊的基本思想：辩证法和历史观。可以说这是一本理论著作，也可以说是一本文学批评，因为它以分析具体文学作品为基础，体现了詹姆逊关于内容和形式、文化和政治尤其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理论见解。在这本书里，詹姆逊集中讨论了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华莱士·史蒂文斯、乔伊斯、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等现代主义经典作家，探讨他们的作品在现代社会境遇里的意义和特点。同时他还探讨了美国文学的独特性，通过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美国史诗的分析以及对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语言理论的考察，对形式和内容以及诗学进行了深入的

理论阐述。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詹姆逊认为现代主义思潮并非只是出现在西方，因此他除了探讨英国、法国、德国、爱尔兰和北美的作家之外，还特别分析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夏目漱石等人的作品，把他们置于整个现代主义运动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一如既往地关注社会政治，几乎在每一篇文章中，他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政治和社会，尤其在最后一篇文章里，他通过分析彼得·魏斯的三卷本历史小说《抵抗的美学》，集中讨论了晚期现代主义对 20 世纪政治表现的复杂性，体现了詹姆逊强烈的历史感和对历史建构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全书可以说是对他的《单一的现代性》的深度阐释，也可以作为在当前语境中对与传统决裂的现代主义运动的再思考。

总之，《论现代主义文学》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力作，它对我们以前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解提出了挑战，因此有人预言它将成为研究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然而，正如阅读詹姆逊的其他作品一样，我们必须拥有相关的背景知识才能理解其中的内涵。如果我们不了解现代主义思潮的社会根源，如果我们没有读过他分析的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很可能读起来如在云里雾里，觉得晦涩难懂。换句话说，读这部作品是一个综合工程，如果结合相关的文学作品深入研读，不仅可以体验其中的奥妙，而且可以使我们获得对现代主义比较全面的认识。打个比方，这是一座富矿，如果你拥有工具并深入挖掘，将得到巨大收获。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合作，本书恐怕难以顺利出版。

本书导言和第一部分由王逢振翻译，第二和第三部分由陈广兴翻译，第四至第七部分由苏仲乐翻译，王逢振负责全书统稿。由于本书涉及面广，难度大，且经常有法文和德文出现，因此翻

译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真诚希望广大读者和方家提出批评和建议。

王逢振

目 录

导言.....	1
---------	---

第一部分

一 总体性诗学	19
二 塞利纳和天真	74

第二部分

三 《魔山》中的形式建构	85
四 卡夫卡的辩证法.....	145
五 寓言与历史：重读《浮士德博士》.....	169

第三部分

六 从历史看《尤利西斯》.....	203
七 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	225
八 乔伊斯抑或普鲁斯特?	248

第四部分

九 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异域特色和结构主义.....	297
---------------------------	-----

十 波德莱尔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身份·····	319
十一 兰波与空间文本·····	339
十二 走近三位现代画家的力比多结构·····	361
十三 关于《幻象》的札记·····	381

第五部分

十四 在可选择的现代性镜像里·····	395
十五 夏目漱石与西方现代主义·····	412

第六部分

十六 唯物主义者马拉美·····	437
十七 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词性·····	470

第七部分

十八 “国王一样的狂人”·····	497
十九 置换的欣快感·····	512
二十 “极端时刻的纪念”·····	523
致谢·····	579
人名索引·····	581

导 言

任何严肃的、持续的与文化经验交锋的连贯性都依赖于某种有效的协调：在偶然性和理论之间协调，在偶然遭遇和理性计划之间协调。诚然，我们总是试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解决这种张力，或从哲学上确认文化经验的偶然性质，或把个人经验归纳到某种理论意义之下。但是，交锋的活力却依赖于保持这种张力的存在。在实践中，这可能意味着某种格式塔的构成，它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作为对文本的评论，或作为对理论的说明。尽管可以在理想上同时实现这两种作用，但两者最终都会使我们回到历史本身，回到文本的历史，同样也回到理论的历史。 ix

这就造成了大量的异质性，它既体现在这里考察的文学文本之中，也体现在三十年来试验过的多种理论的语境之中。我倾向于认为，面对关于写出和说出的材料的选择——某些写得过分，某些在修辞上夸大——这种不平衡性本身将证明是对读者的一种解脱。至于重复，我会因它们的不在场比读者更感到不安；不论是好是坏，不论你觉得自己是否能够做到，辩证法都要求你同时说明一切相关的事物；而这必然意味着你不可能回避某些问题，因为你已经在其他地方谈到了它们。人们从未明确地论述这些问题；但可以肯定，从艾森豪威尔时期到全球化时期，产生这些问题的境遇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它们的面貌。

但是，并非只是理论参照的论点（萨特、黑格尔、德勒兹、格雷马斯、卢卡奇、阿尔都塞、阿多诺，等等）可能采取折中的方式，或者说得更严重一些，遵循更可疑的知识方式的规则。文

学文本也可能被认为形成某种个人的经典，即使实际上不是更普遍的有效性的集合。但那是进行没有缺失的推断，不论我感到多么遗憾，缺失本身也是偶然的事情。似乎只有日本被要求代表非西方世界——实际上我甚至可以说是非欧洲世界；它们很少记录拉丁美洲、北非或中国对我的影响。确实，就我自己的事业构成而言，我不能不感到困惑的是缺少了庞德或福克纳，或与我密切相关的整个法国的现代传统。诚然，有时会对这种空白做些职业的解释：这本文集里所讨论的一些文本，乃是因为我在课堂上或在讨论课里教授它们；就像我觉得同样重要的作品和作家常常缺失完全是因为我太过经常地教授它们。

然而，这些说法和辩解恐怕难以消除读者的怀疑，他们会认为，这些分析——尤其它们意味着是伴随我的《单一的现代性》的源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说明现代理论的这种或那种构成因素。但《单一的现代性》是在本书大部分论文之后才考虑的，而且它对现代主义的理论阐述是有些勉强的应时之作，基本上围绕着卢曼关于强化社会世界不同因素和层次的分区的概念组织的。较早的版本，或柏拉图式的神话，从正在全球弥散的物化现象的文化后果方面^[1]讲述了这个故事。（根据我对卢卡奇的物化概念的理解，它本身包含着韦伯的理性化，而这种修辞本身显然与卢曼的概念密切相关。）不过，本书收入的文章也调用了一些其他解释的信条：阅读公众的分裂，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观点的不可调和，乌托邦语言的消失（或试图发明一种的努力），关于特定历史内容不可再现性的内在局限，关于语言和叙事结构的某种新的空间感的压力，个人语言和分类系统之间的张力，革命的时刻和叙事构成的时间之间的张力，非普遍化的感觉或身体资料的出现，等等。毫无疑问，这些信条或解释的框架相互关联，但他们的概念语言却会把我们带到不同的方向，而这些不可能汇聚在

一起。

然而，即使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的哲学和风格信念相悖而把这些文章读作这种理论的例子，即使它们以某种方式使“历史主义”戏剧化——我从不曾抛开“历史主义”这个词，琼·考普杰克 (Joan Copjec) 有效地将它概括为“把社会 [可能还有它的文化产品] 归结为它的内在的权力和知识的关系网络”^[2]——那也决不是我看待它的方式。我甚至不在乎这些讨论隐含着使旧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长期存在的意思，尽管雷蒙德·威廉斯 (和其他许多人) 很久以前就告诉我们应该放弃这种对立。稍后我会更多地谈对立问题，但这里我想坚持说，即使基础和上层建筑仍然相关，我对它们的关系或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看法也决不只是一种反映或重复。毋宁说它是一种境遇和反应，是各种上层建筑的一种创造，虽然上层建筑涉及国家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境况，但这种境况并不是“它们自己造成的”。诚然，那种基础境况的性质可以重新构建，可以根据反应重新构建，可以根据解决矛盾的或摆脱死亡控制的努力重新构建，也可以根据强加给“社会象征行为”的限制重新构建，因为这种象征行为涉及那种特定的而非其他的历史境况。

xi

但是，还有一种论点也可以用来支持“历史主义的归纳”——如果你仍然愿意用这个术语。这种论点是：在英美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理论兴盛之前的氛围中，在美国 (不包括英国) 当时的主观主义和心理主义的语境中，在一切都被事先“归纳”为私有的和个人的社会里^[3]，任何坚持公共的、经济的、政治的看法，任何强调“包括历史”的主张，都具有扩大文化文本意义而不是缩减其意义的价值，都具有扩大它们反响的价值，即增加它们的复杂性和象征层面的数量，在特定的行为或象征姿态或表达被定位和理解的语境中变得更加丰富。

因此，值得进一步坚持境遇论的哲学创新性，尽管在这里有些冒险。实际上，正如理论论证的，如果我们通过某些概念范畴对现实资料进行加工——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一种由康德首创的认识论模式——那么我们应该增加熟悉的提示，不仅因为这种范畴是历史的，可以进行修改，而且因为它们在现代时期所经历的明显的历史修正之一是这样一种转变：从由实在的或以事物组织的范畴体系——通过这种范畴体系外部世界被理解为大量的事物或静止的物质——转变到由一系列新的过程组织的范畴，而各种这样的范畴通过当代哲学可以得到确定。人们不太注意的是“境遇”范畴^[4]作为构成人类活动力量的中心作用（不论用什么术语）：这是因为我们把特定的现时资料组织成一种境遇，我们被迫以某种方式对它做出反应，即使这种反应缺乏生气或是被动地接受影响，我们也可以从行为和实践方面重构或重新解释这样的相互作用。当我们必须论及艺术作品时，这种重构决不是容易的或普通的问题；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它会变成所说的表征批判的一个本质的特征。

xii 然而，这种假定的境遇中的新的行为对立——不论受到海德格尔同样首创的存在世界的概念什么影响——在本书中仍然可能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伪问题的牺牲品，或最古老的意识形态陷阱的牺牲品；这种陷阱就是主体和客体对立的问题，对海德格尔本人来说，就是围绕现代性堕落了的一切事物的根源（实际上，正是这种基本错误的观念，他本人首先命名为“表征”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5]是否这里提出的境遇概念——它本身也许可以看做是试图不正当地偷偷回到前面提到的旧的甚至更声名狼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只是另一种关于主体—客体二分法的无效的新发明？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想对二元对立本身进行某种辩解，或者

赞扬结构主义的重新发现，因为我一向觉得这种发现是通向辩证法新发明之路的一个里程碑。当然，这种重新发现可能有多种解释：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在所有我们的概念构成里，关于对立的中心作用的证明已经指向了两个方向。一方面，它可能呼吁我在这里提出的那种赞扬；另一方面，它表明任何有意义的观念或意识形态批判的更深层的使命，恰恰应该是找出（并根除）这种二元对立，而二元对立可以被看做是意识形态本身的原始形式。

事实上，这两种方案都可以接受，只要它们不使我们回到某种德国唯心主义的概念，如先于二元对立的超验的、不确定的同一性概念（在对谢林的一次激烈抨击中，黑格尔称这等于说“夜里所有奶牛都是灰色的”^[6]）。另一种同样谨慎的考虑可以在萨特所认可的回忆他的一个老师的警告中发现：“一切事物都始于思维，除非你能摆脱它。”当然，如果人们不是从一开始就试图以某种方式摆脱他们最初的封闭或双重约束（尤其如果人们预先就被警告：很容易地申明自我意识或内省性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那么寻求对立只不过是一种机械的或附加的过程。

于是，这就是一切事物都始于二元对立的意思，除非发明出某种摆脱它的策略：以某些方式超越它，这些方式与那种旧的但仍有影响的对辩证的讽刺无关，因为它一般假定辩证的结论是论点和对立面的某种“综合”，而二元对立被断定由对立面构成。但是，人们如何摆脱二元对立不可能提前预告；解决的办法对于特定历史或形式的境遇总是具体的和独特的，而境遇本身总是独特的。

但是，如果问题总是和解决办法一样独特，那么这种观点怎么能导向对方法有用的陈述？实际上，也许每一种所谓的二元对立本身都非常独特，以至它在“对立”这种概念范畴之下首先失

xiii 去了自己的类别？当然，倘若如此，不仅我在这里建构的理论框架会倒塌，而且关于“对立”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批判也会随着倒塌（并使海德格尔最初对表征的判断也随之失去意义）。

如果我们认识到，摆脱二元对立并不是要消除它们，而是常常意味着使它们增多，把最初的意识形态起点作为一种更复杂的构成的开始，同时这种构成又是一种更复杂的判断，那么它们的前景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改变。作为这一过程的实例，我要提出另一种对立，它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一样也受到强烈的指责——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它密切地与那些对立相关——但这种对立更密切地关系到本书文章中的文学的对立，也就是把形式和内容联系起来的那种传统的对立。

因为已经说过，我在这里和我作品其他地方所赞同的绝对历史主义（这一术语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概括），同样也是一种绝对的形式主义。这一点很快会得到证明，甚至对很随意的读者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在后面的文章里有大量关于形式的讨论（更普遍地出现在对现代主义的讨论里）。但是，谴责这种形式主义并根据对现代主义文本的讨论为强调内容的主张进行辩护，难道不是一切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责任吗？确实是，但20世纪的现代历史在某些方面充满了不应该这么做的可资教训的实例，因此这里重新进行某些严肃的理论阐述也许是适宜的。

每个人都懂得，只强调形式或内容的一个方面而不考虑另一个方面，必将导致歪曲和无益的后果（不论它们对未来的著作和论述具有什么启示性）。作为一个贬义词，“形式主义”常常被限定为强调纯粹的形式，本身没有任何内容；但是，如果我们谈到某些时刻，例如福楼拜的时刻，其中形式生产的真正目的是消除内容^[7]，这时我们就再次接触到历史。与此同时，对内容的排他性的强调不可避免地、不知不觉地被变成了对这种或那种特定内

容的规定，对于这种规定形式是透明的、确定的，但这种规定的失败（偶尔也会成功）很可能会重新唤起某些方面的生产意识，其中，正如内容是形式的前提条件，形式也是内容的前提条件。

我一直觉得，要克服形式和内容的对立（即使它富有成效），必须使它复杂化，而不是消除其中的一个方面。这是不是说这里重又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那种旧的伪黑格尔式的幻景，其中真理在中间某个地方，而形式和内容以某种新的综合最终相合（这种综合当然指艺术作品本身）？并非如此；然而正是通过对两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坚持一种双重的视角，我们才可能找到一个更满意的答案，而那种双重视角也才不像是单一的，而是一系列的部分的综合。

xiv

无论如何，答案在于把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二元对立看成是四方面观点的组合，而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二元论，而对于这些可能性，我从赫捷姆斯列夫（Hjelmslev）的语言学借用了一种简单的通俗化的模式^[8]，它和一种更纯粹的以形式为主导的观点（“形式的形式”）和以内容为主导的观点（“内容的内容”）一起增加了两种新的对立，而这种新的对立是把每一种关于现实的观点纳入思考的结果。我们由此达成了新的关系，它分别表示为“形式的内容”和“内容的形式”，而一旦新增加的对立使我们陈旧的形式和内容观受到足够的震惊和遏制，即使不是挑战，我们便会处于一个更好的地位来评价这一古老的二元论仍然可以提供的可能。通过从同一范畴的观点观察形式和内容——平行的现象——我们就可以使那些可能清晰可见，现在它们分别以垂直的表示方式来运作：

	形式	内容
内容	内容的形式	内容的内容
形式	形式的形式	形式的內容

实际上，这些结合或这些观点中的每一个都会投射出某种类型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既有自己的实效也有自己的局限；同时，在外部边界上，从描述转入规定时，每一种都会假定一种特定的美学，并假定作者遵循的计划。我要提出的是，这种规定是不合理的，正如它们对冷战的极端看法现在所证明的那样：一方面是陈旧的社会现实主义，另一方面是充满反讽、悖论和自身指涉的令人厌倦的语言形式主义。对于历史时刻和境遇的判断或解释，本书的文章肯定要对特定的审美实现预设一些征象的价值；但首先还得有作品。在实际政治生活里，我们不可能没有对未来的设想，但我们并不一定要预言未来的艺术，而艺术总是以一种双重的方式做这样的事情：首先，通过艺术家自己的形式实验，对形式的检验是为了使它们得以继续；然后，通过个人的趣味和审美倾向及直觉，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使我们作为鉴赏家和消费者面对它们。无论如何，当前
xv 这本书里没有任何东西要构成某种规定，而非常好的理由是，这里讨论的文本的存在有赖于现代主义的条件和境遇，而这些都不再是我们今天的状况。

现在我们回到任何关于形式和内容的假想都可能提供的四重可能性，我将尽量简要地概括每一种的最熟悉的结果的特征。对“内容的内容”的强调必然是一种指涉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我们会尽力辨识社会和历史现实，因为文本产生于这种现实，一般也表现这种现实。我想，文本产生于某个真实的社会，它的语言不论怎样虚构也必然使用一个时期有其自身指涉的语言，对这种看法不可能有什么严重分歧。对于希望读者具有历史境遇的某些知识，对相关词语的历史意思有某种语言背景（例如，康拉德用的“帝国主义”是什么意思——见本书第七篇文章），同样也不至于有多大分歧。